

钱德明

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

龙云著

J O S E P H - M A R I E
A M I O T (1 7 1 8 - 1 7 9 3) :
U N I N T E R M É D I A I R E
C U L T U R E L E N T R E L A
C H I N E E T L A F R A N C 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钱德明

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

龙云著

J O S E P H - M A R I E
A M I O T (1 7 1 8 - 1 7 9 3) :
U N I N T E R M É D I A I R E
C U L T U R E L E N T R E L A
C H I N E E T L A F R A N C 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龙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1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6365-5

I. ①钱… II. ①龙… III. ①钱明德(1718~1793)—人物研究 IV. ①K835.6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1314号

- | | |
|-------|--|
| 书 名 | 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
QIAN DEMING: 18 SHIJI ZHONG-FA JIAN DE WENHUA SHIZHE |
| 著作责任者 | 龙 云 著 |
| 责任编辑 | 初艳红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365-5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alicechu2008@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7.25印张 283千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5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总序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写那篇东西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应国际上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消解论”,二是为愈来愈被边缘化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正名。《北京大学学报》刊发此文时附有如下“摘要”:

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学科,只要文化交流一天不停止,比较文学就没有被“消解”的理由。作为这门学科最原初的研究领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学科中的地位曾大起大落,至今仍在某些地区、某些学者中受到轻视。然而,它一直在反思中前进,它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引入了问题意识,引入了文学批评的精神。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维系着本学科的身份与根本,它过去是,今天与未来也应是本学科最基本、最主要的研究内容。

这个颇有些“檄文”味道的“摘要”,是我应编辑部要求而自拟的。我在这里重新引用它,皆因它概括了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而末尾几句,尤其点明了策划这一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的基本立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摇旗呐喊。不过,毕竟是人微言轻,虽聊胜于无,却很难有大的反响。面对外部世界热闹非凡的大环境,面对人们求新求变求大的普遍心态,面对电视台、广告牌里充斥着的“闪亮登场”“华丽转身”“震撼推出”一类的夸张表述,那些希冀被人仰视、受人推崇、轻而易举地就能占据学术制高点的种种举动就都变得不难理解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具体到中国而言,更多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则没有这般显赫、亮丽的外表,更没有这个时代人们竞相追逐的高回报率。它要求研究者屁股坐下来,老老实实从梳理资料开始,从认真阅读文本开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点点滴滴地积累和建构起足以支撑一个课题研究的宽广的知识场。不仅如此,它还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批评意识,质疑现象,提出问题,探幽索微,揭示本质。这是

何等清苦而寂寞的过程!在凡事都讲效率、讲性价比的当今世界,又有多少人愿意承受这般的冷清和辛劳?但我很庆幸,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执教的二十年时间里,有一群学生愿意与我一样,做这个一点都不“华丽”、更不“震撼”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我的幸事,更是学科的幸事。

如今他们已成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里。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在忙碌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中依然没有丢弃如此需要时间、需要砥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了一群人在踏踏实实地做,在课堂上讲,在研讨会上谈,在文章中写,再去指导他们的学生……这就变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论证和宣传,它让本学科最基础、最本质、最核心的研究方向得以发扬,得以光大,得以传承。

这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就是专为他们设计的。我希望借此平台展示他们的研究,向学界推荐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丰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而之所以使用了限定词“中法”,则是受我本人研究范围所限。我是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生们也就大多沿袭了此一方向。当然,如有可能,我也希望未来能推出其他双边或多边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来。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和法兰西是两个响亮且诱人的名字。这两个文化大国,各自以其璀璨的文化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都对对方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又都从对方那里汲取了有益的成分来革新、滋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其生生不息。这样一部丰富、瑰丽的历史,为中法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研究对象与视角。

本丛书没有愧对这样的多姿多彩,它的选目及作者同样也异彩纷呈: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论著,都是作者们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丛书的作者既有中国人,也有法国人;他们的论文既有在北大答辩的,也有在巴黎四大答辩的,其中有一些是在中法双方导师合作指导下完成的。丛书涉及的内容不仅是中法文化、文学间双向的对话、接受、互视、互补,而且横跨了数个世纪,涵盖了整整一部中法文化交流史:从两国间文化交流滥觞的17、18世纪,直至交流已成定势、成共识的21世纪。所处理的文本则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除了戏剧、小说、诗歌外,也不乏难

以归类的记游作品、报纸杂志,甚至一切可冠之以“文”的材料……同样纷繁多样的还有作者们的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形象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不一而足。而且往往在同一部著述中,又数个方向并存,彼此切换勾连照应。

尽管有这般的千差万别,本丛书的著述仍然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首先是作者们的研究和立论都建立在第一手中西文资料的基础上。说到这一点,或许应特别指出,不管他们最终在哪里答辩,作者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都曾在中国政府或法国政府的资助下,远赴对象国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呼吸异国的精神文化空气,切身感悟异国的文化氛围。其次是所有的论著都是个案研究。这就保证了这批年轻的学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建构起相应的知识场,尽可能地穷尽相关资料,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科学性。但这些从小处入手的研究,却不乏大的抱负。我们可以看到,入选的每一本书都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文学史关怀。研究中国文学流播法国的作者,汲汲于讨论中国文化因子、元素,为何和怎样参与了法国文学的变革;处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作者,则念念不忘探讨法国文学、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作用。一国文学,因为与异文学的相遇、交流、对话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比较文学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从而也就丰富甚至改写了接受国的文学史。由此牵连出的,是作者们对变化过程的重视。而在这种对过程的描述和讨论中,文学史就必然与思想史、心态史、社会史,甚至经贸史、外交史相交叉、相关照、相联系。如此宽广的研究场域才保证了他们可以进而去探讨接受国的观念是如何在与异文化的对话、对质中渐变、革新的。不仅如此,这些年轻的比较学者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他们知道:一国文学在异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不仅在时间上延续了原著的艺术生命,而且在空间上也由于跨文化变异而赋予了原著以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必将进入我们称之为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所以说到底,他们瞄准的是书写世界文学史。

以上这些共通点,既有对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继承,更体现出了作者们对方法论变革的自觉。我在“摘要”中强调的那些最根本的变化,完全可以引这些著述为证。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们并没有“鹦鹉学舌”般地照搬各种新概念、新理论,而是将一切适用的东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研究中,并且以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再去补充和完善现存的理论和方法。所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钱德明及其时代	14
第一节 钱德明所处历史文化语境	14
第二节 钱德明生平及在华文化活动	36
第二章 钱德明著述研究	74
第一节 钱德明笔下的中国历史形象	74
第二节 钱德明与孔子	94
第三节 钱德明与中国音乐	117
第三章 钱德明翻译研究	128
第一节 钱德明与诗体翻译——以《御制盛京赋》为中心··	128
第二节 钱德明与《中国兵法》	146
第四章 钱德明与中西文化互动	171
第一节 钱德明与贝尔坦	171
第二节 钱德明与《博学杂志》	180
第三节 钱德明与学术大辩论	187
第四节 钱德明与法国作家	201
结 语	209
参考书目	213
附录:钱德明年谱	234

导 言

18世纪是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时期,“中国热”激发起了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蔚然兴起的“汉风”不胫而走,来自遥远东方的异国情调随之也成为文人哲士笔下的重要主题。“中学西传”则离不开早期耶稣会士的辛勤开拓,他们中间有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

18世纪后半期,中国从盛世气象、“万国衣冠”到不得不处理英国使团的礼仪问题;而欧洲方面则经历了耶稣会的解散与法国大革命。从东方到西方,从教内到教外,从社会到政治,凡此种转折都表明钱德明在华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多事之秋”。

钱德明身处在这样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他同时肩负着多样性的文化身份,正如他的一首小诗所言:“法兰西人、满人、汉人、官臣、教士/每一个身份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如果说他是有作为的文人/阅读他的作品,每个人都可以品评。”^①

1718年,钱德明出生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海滨的土伦港。1749年,他前往东方投身传教事业。此后,“他一直英勇无畏、孜孜不倦地向异教徒传播着基督信仰。他属于上帝,属于罗马教廷,属于耶稣会。”耶稣会解散之后,他“依旧将全身心献给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努力地推进着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侄孙阿尔方斯·阿米奥(Alphonse Amyot, 生卒年不详)看来,“钱德明神父是名副其实的法国人与爱国者”^②。

钱德明亲自参与和见证了18世纪后半期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他留下的大量法文著译作品从多个层面向法国和欧洲介绍了中国文化。在传递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他引起了法国知识界和科学界的关注,并且产

① Amiot, *Correspondance de Bertin*(《贝尔坦通讯》), Institut de France(法兰西学士院), ms(手稿), 1515. 该诗由笔者自译。如无特别说明,所有译文皆由笔者自译。

② Alphonse Amyot, *Les hommes utiles. Vie et testament du R.P. Amiot, membr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missionnaire apostolique en Chine, 1718-1793*, Paris, Charles de Mourgues Frères, 1881, pp. 7-8. 钱德明侄孙署名为 Amyot, 钱德明本人手稿均署 Amiot。

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参与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讨论,他是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是贝尔坦(Henri Bertin, 1719—1792)和诸多文人的笔友^①,《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1776—1814)的主要撰稿人,汉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可以说,梳理法国汉学史则始终绕不过钱德明,提到18世纪中法文化关系也不能忽略他的贡献,他已经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符号。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媒介人物,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如何?在检讨相关著述之后,我们可以简单地勾勒国内外关于钱德明研究的课题史。

一、研究现状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②、法兰西学士院图书馆,以及法国耶稣会档案馆进行检索之后,笔者较详尽地掌握了关于钱德明研究的一手材料(大量手稿、信札、出版物等)和二手材料(相关研究资料)情况。简而言之,大致有三类围绕钱德明研究而展开的论文和专著:一、关于生平和作品的概述性研究;二、从传教史角度对钱德明及其时代的研究;三、从某个特定角度进行的比较性研究。

(一) 钱德明生平及著作研究

西方早期出版的某些辞书、工具书侧重介绍了钱德明的生平与著作,这类辞书因为其本身性质的限制,介绍性的文字常常流于粗疏,大都旨在提供简单的提要或材料索引,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献资料方面。

最早的辞书当数巴凯(Backer, 1809—1873)所著《耶稣会作家书库》

① 贝尔坦是法国18世纪重要的政治人物。1749年,贝尔坦担任鲁西雍总督,1754年任里昂总督,后担任巴黎警长(1757—1759),1759年至1763年担任财政总管,其改革措施遭到巴黎法院的抵制。1763年12月14日,贝尔坦受命组建国务秘书处,负责东印度公司、农业、矿业、内河航运、公共交通和档案管理等工作。1780年5月26日,他正式辞职。大革命后,他于1791年离开巴黎。1763年,贝尔坦入选法兰西科学院,1772年入选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参阅 Jacques Silvestre de Sacy, *Henri Bertin dans le sillage de la Chine (1720-1792)*,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0.

② 主要指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rue de Richelieu)东方稿本部(Manuscrits orientaux)、西方稿本部(Manuscrits occidentaux)、音乐部(Musique)、地图和图片部(Cartes et plans)等。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巴凯称:“关于钱德明的文章由马提埃·洛拉斯神父提供;他希望为本国耶稣会士撰写一部巨著,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写作提纲与本书不同,故该传记显得比较特别。”当时,巴凯坦诚自己缺乏钱德明的生平资料,唯一的途径“只有通过他留下来的大量著作来了解”。虽然小传中存在一些不准确的信息,但是其奠基性的作用远不容忽视。巴凯从四个主题入手概括了钱德明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一是语言文字研究;二是中国历史与纪元研究;三是中国技艺研究;四是杂类研究,包括译诗、通讯和著作等。巴凯对钱德明的著译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统计,但由于某些手稿当时尚保存在私人收藏家之手,所以仍然有缺失现象。作者在提到手稿时曾说:“菲蒂斯(François Joseph Fétis, 1784—1871)言及在巴黎书商内珀(Nepveu, 生卒年不详)处见过三卷钱德明亲笔书信,这套书信可能来自《中国杂纂》出版者的工作室。”因此,巴凯也仅只收录了《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1702—1776)和《中国杂纂》中公开刊行的信件,这是最早的钱德明传记和相对详尽的作品提要。^①

索麦沃热尔(Carlos Sommervogel, 1834—1902)在《耶稣会作家书库》(*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中介绍了钱德明的生平和著作情况。他指出,巴凯“错误地将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论文归到钱德明名下,而钱德明在1777年9月28日致贝尔坦信中否认自己是该文的作者。真正的作者应该是韩国英(Cibot, 1727—1780)……且并不存在发表于1765年的论文,实际上发表时间应当是1773年。”虽然索麦沃热尔在手稿方面尚存在某些遗漏,不过作为早期的工具书,它已经提供了一份相对完整准确的清单,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钱德明档案研究不断完善的历程。^②

菲蒂斯在《音乐家全传》(*Biographie universelle des musiciens et*

① 作者将钱德明从欧洲出发时间误为1750年,抵华时间误为1751年;并误将《论中国文字》(«Lettre sur les caractères chinois», du 20 octobre 1764, *Mémoires*, t.1, pp. 275-325)一文归到钱德明名下,实际上这是韩国英神父的作品。详见Augustin et Alois de Backer, *Bibliographi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ou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Troisième série, Liège, Imprimerie de L. Grandmont-Donnders, 1856, pp. 26-44.

② 参阅Sommervogel, Carlos & de Backer, A. S.j., *Bibliothèque des écrivain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Bruxelles-paris*, 1890-1932. t. 1, pp. 294-303.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 la musique, 1878—1883)中为钱德明立有小传。作者从音乐角度讨论了钱德明的作品:“这位耶稣会士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严谨准确,实际上在阅读时则必须谨慎小心,仔细研读就可以发现作者只具备中国音乐实践的模糊概念,他并不能破解该民族各种乐器的特殊发音系统。他只字不提这些有趣的内容,在有关各种乐器的细节中,他恰恰忘记谈及制造原理和尺寸大小。”菲蒂斯提到了从法文本转译到西班牙文的《古乐经传》(*Kou-Yo-King-Tchoan, ou Commentaires sur le livre classique touchant la musique des Anciens*, 1753?),但是“虽然有这么清楚的出版信息,我还是很怀疑这本书的存在,因为让人在马德里进行了广泛的检索,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最让人恼火的是钱德明的手稿已经散失,可以肯定的是,当鲁西埃(L'abbé Pierre-Joseph Roussier, 1716—1790)^①在负责出版《中国古今乐记》(*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1776)时,钱德明的手稿还保存在国王图书馆。”^②该书是音乐类辞书,故并未涉及钱德明的其他作品。^③

第一本有关钱德明的单行本是其侄孙阿尔方斯·阿米奥所著《有为之人——钱德明神父生平及遗嘱》,书中刊印了神父的数封家书,以及在北京留下的遗嘱。作者未参考除家书外的其他钱德明通讯手稿,另外,经历

① 鲁西埃生于马赛,后入神学院学习。1754年,他来到巴黎,获得诺曼底爱古伊(Ecouis)议事司铎职,1790年左右在此去世。25岁之前,他连音符都不认识。后来,他产生了学习音乐的欲望,于是热情地阅读拉莫的著作,当他觉得已经领会其原则之后,于是开始想对这些原则加以解释运用。他的处女作出版于1764年,主要讨论和弦问题。参阅 François-Joseph Fétis, *Biographie universelle des musiciens et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 la musique*, 2^e éd., t. 7, 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s, 1866, pp. 338-340.

② 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所涉钱德明作品中译名皆参阅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

③ 菲蒂斯将钱德明去世时间误为1794年。据笔者推测,所谓西班牙语版本并不存在,很可能指藏于马德里王家图书馆之《大舞》(*Grandes danses*)。《古乐经传》是钱德明来华之后最早尝试的翻译作品之一,约完成于1753年,据鲁西埃称,该手稿于1754年到达铭文与美文学院秘书布甘维尔(Jean Pierre de Bougainville, 1722—1763)手中(参见《中国杂纂》第6卷第6页注b)。该译稿现遗失。据陈艳霞考证,该手稿曾被鲁西埃从法兰西学士院图书馆借出,而后不知所终。《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90页冯承钧案:“《古乐经》,有二:一明湛若水撰三卷;一清李光地撰五卷。未识德明所译者何本。”此处不存在疑问,钱德明所译为李光地著作。详见 François-Joseph Fétis, *Biographie universelle des musiciens et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 la musique*, Bruxelles, Méline, Cans et Compagnie, 1837, pp. 65-67.

了法国大革命,钱德明的家书也大都荡然无存,所以该书所掌握的资料尚不够全面。作者坦承:“我们缺少资料,也缺少信息,不能为这位值得尊敬的博学家作传;但他的荣誉却存于四卷《耶稣会士书简集》和十五卷《中国杂纂》^①之中。出自这位值得敬重的博学家传教士的书信和论文,可以说是这两套富有教益的丛书的最美点缀。”该书披露了几封硕果仅存的家书,如钱德明给侄子的信件:“谢谢你告诉我家庭中的大小新闻,替我热情地拥抱你的父亲,说我永远全身心地爱着他,一直都在为他祈祷。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人世重逢,希望我们以后到天堂再见。请问候你温柔的母亲、你聪明而谨严的妹妹、你亲爱的妻子,以及你身边的所有家人!”^②这些家书流露出丰富的个人感情,可以窥见钱德明远离亲人故土、人生迟暮的精神境况。在该书最后,作者统计了钱德明已经发表的通信、著译作品,以及寄给贝尔坦的中国艺术品。

此后,高第(Henri Cordier, 1867—1931)^③研读了法兰西学士院图书馆收藏的钱德明手稿,在《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1904—1922)中开列出详细清单,并附上简单提要,这是第一份钱德明现存手稿的详细目录,为后来的研究做了资料性铺垫工作。高第的工作有其创新之处:一、高第通过研读钱德明手稿等原始材料,确认钱德明本人的签名形式为Amiot,而不是Amyot。此前两种写法均被人采用,高第统一了其姓氏的拼写形式。二、在整理手稿的基础上,从1777年9月28日的信中,进一步确认钱德明不是《中国杂纂》第一卷《论中国历史》(*Essai sur l'Antiquité des Chinois*)和《中国语言文字》的作者。三、详细统计了法国铭文和美文学学院保存的钱德明书信手稿,三大卷计八十封。该《书目》中的不少内容是对巴凯和索麦沃热尔之书的补充。^④

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1934)中用了二十多页篇幅介绍钱德明生平、手稿和出版物,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检索信息和出版年表,是目前最方便、

① 钱德明在世时,《中国杂纂》只出版了前十五卷。第十六卷出版于1814年,其中未收录钱德明的作品。

② Alphonse Amyot, *Les hommes utiles. Vie et testament*, pp. 13, 32.

③ 亦译作考狄。

④ 参阅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2^e éd., vol. 2, Paris, 1904-1922, pp.1040-1041.

全面的参考工具。^①费氏编著此书时身在中国,缺少法文资料,所以也存在一些不准确的信息,但在该书最终出版之时,有关问题则得到了澄清,如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作者之争等。该书罗列钱德明信件102封。在手稿方面,该书参照了高第书目,所收内容亦更为全面。此后,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1903—1990)编成《补编》(*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1800*, 1973),补充了有关钱德明画像的具体信息。^②

除辞书之外,还有少数介绍钱德明生平事迹的论文,如《欧洲来华作家——耶稣会士钱德明》(*An European pen in China: Jean Amiot S. J.*)^③,《18世纪杰出的土伦籍汉学家钱德明》(*Un éminent sinologue toulonnais du XVIII^e siècle, le R. P. Amiot, S. J. 1718-1793*)等。后文简单评述了钱德明的生平,列举了他的著作,并且纠正了某些错误。如在其生平部分,作者指出:“钱德明1718年出生于土伦。某些传记错误地认为是2月18日。”作者对钱德明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记忆超群,语言能力惊人,……在各学科拥有广泛深入的专业知识,精通汉语和满语……他热情地学习中国历史、风俗、古迹、艺术,没有任何同行能出于其右。”该文末尾记载:“1942年4月2日,在我的建议下,土伦市政府通过法令将一条街……命名为阿米奥街。”^④

米歇尔·埃尔芒斯(Michel Hermans)新近完成的《钱德明,启蒙时代与“他者”交流的代表人物》(*Joseph-Marie Amiot, une figure de la rencontre de « l'autre » au temps des Lumières*)所搜集和掌握的资料最为全面准确。^⑤我们知道,早期的资料性研究工作常有粗略的缺憾,存在史

① 参阅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Shanghai, 1932-1934.

② 参阅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1800*. Rome-Paris: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Letouzey & Ané, 1973, pp. 12-13. 画像见于《中国杂纂》第15卷卷首,法国国家图书馆图片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手稿1515、1516和1519卷首。

③ 参阅 J. W. King. «An European pen in China: Jean Amiot S. J.», *Catholic Choirmaster* 47, 1961, pp. 60-62.

④ 参阅 Emmanuel Davin, «Un éminent sinologue toulonnais du XVIII^e siècle, le R. P. Amiot, S. J. (1718-1793)»,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Guillaume Budé*, 1961, pp. 380-395. 阿米奥为钱德明的法语名音译。

⑤ 该文收入 Nicolas Standaert, Yves Lenoir, *Les danses rituelles d'après Joseph-Marie Amiot: Aux sources de l'ethnochorégraphie*,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Namur, 2005.

料错误或者材料运用的疏忽。正如埃尔芒斯所言:“从很多角度来说,就连钱德明唯一的大部头传记《钱德明和北京法国传教会的幸存者》(*Joseph Amiot et les derniers sur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1750-1795*)今天也已经过时。”^①埃尔芒斯的作品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全面占有材料,尤其是原始材料,作者几乎搜罗了法国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有关钱德明的所有原始文献,对前人的资料工作有所突破。该文中提到了一些此前从未被提及或引起注意的原始手稿,为尽可能地利用原典恢复历史真实提供了线索。第二,对某些悬案追本溯源,廓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②第三,埃尔芒斯跳出了早期生平、著述研究相对狭窄的视野,偏重于从文化交流角度去读解这个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媒介人物,注重勾勒钱德明学习、了解和著述中国文化的全过程,将其放到更广阔的文化空间里,进而探讨某些著述的前因后果。同时,作者注重塑造钱德明的文化人格形象,将其置于与欧洲文化人的关系网络中来加以考察,这是该传记的突破点和新颖之处。埃尔芒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钱德明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

(二) 传教史角度的研究

罗什蒙泰(Camille de Rochemonteix, 1834—1923)在研究钱德明手稿之后,编著了《钱德明神父和18世纪晚期的北京法国传教会》(*Le père*

^① Michel Hermans, *Joseph-Marie Amiot, une figure de la rencontre de «l'autr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p.12.

^② 埃尔芒斯分析了《钱德明神父和北京法国传教会的幸存者》一书作者罗什蒙泰认为《中国语言文字》一文属于钱德明的原因。罗什蒙泰说:“(这封信)本来是写给伦敦科学院的,却被寄到了巴黎铭文和美文学院,而且可能是寄给常务秘书德经(De Guines, 1721—1800)的。巴黎耶稣会档案馆保存着寄送该文(指《中国语言文字》)的亲笔信。”(参阅 *Joseph Amiot et les derniers su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1750-1795*, p. 84; 另见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 p. 844 注 1:“罗什蒙泰将其归为钱德明,证据是钱德明于1765年写给德经的一封未发表的信件。”)埃尔芒斯认为,该信是寄给铭文和美文学院的,但钱德明虽然对伦敦科学院的问题很感兴趣,最后却并没有研究成果,而他却对周边属族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于是将不同的词汇表翻译成拉丁语,主动推荐给法国铭文和美文学院。据此推测,钱德明寄的不像是罗什蒙泰所谓的那篇论文,而是周边民族词汇翻译表。虽然这一结论早为人知,但论证的角度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的批评均从钱德明亲笔信中否定自己是《中国语言文字》一文的作者入手,埃尔芒斯则从原始材料的解读中来证明此前对原始材料的误读,从而为该问题画上了圆满句号。

Amiot et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发表在耶稣会杂志《研究》(*Etudes*)上。^①1915年出版单行本,题为《钱德明神父和北京法国传教会的幸存者》。该书主要讲述18世纪晚期法国在华耶稣会士的活动概况,涉及中国传教情况的方方面面,包括耶稣会解散的来龙去脉,资料非常翔实。该书并非钱德明评传,但在他的身上着墨较多,重点描写了他在法国传教会兴衰更替中的爱国之心。钱德明用忧伤的笔调刻画了自己的心情:“耶稣会士不存在了;法国传教会的财产、房屋、教堂、在北京的房产、在京城郊外的土地,从1776年以来路易十六给他们颁发的年薪,这一切都被遣使会接手。”他的周围“弥漫着一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他在艰难的环境中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为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画上了句号,他们以自己的学识、科学、文艺工作在中国声名显著”^②。作者将钱德明在华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从1750年到1766年的第一阶段,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中国语言之上;第二阶段是1766年之后的学术丰收期,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化研究和文学通讯之中。通过钱德明等耶稣会士的活动,作者再现了18世纪晚期北京法国传教会的历史面貌,是一部比较详尽的传教史研究专著。

高第著有《耶稣会的解散和北京传教会》(*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ékin*, 1918)一书,他在研究耶稣会晚期传教士通信手稿基础之上,详细梳理了这一时期的传教史与北京传教会的情况。该书内容跟上面的著作有不少相似之处,并且大量征引了钱德明的书信手稿。高第通过翔实的史料进一步分析了法国耶稣会士在该会解散之后的形势,会内的分裂,会外和南京及澳门教区的斗争,以及与罗马教廷的交涉。由此可以看出钱德明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法国在华传教事业的感情。该书写到遣使会接替耶稣会之后而告终,史料丰富翔实,历史线条清楚,是了解钱德明所处时代环境尤其是耶稣会内部环境的重要著作。^③

① 参阅 *Etudes* du 5 janvier 1903, pp. 26-47; du 20 janvier, pp.175-196; du 5 février, pp. 338-355.

② 参阅 Camille de Rochemonteix, *Joseph Amiot et les derniers survivants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à Pékin, 1750-1795*, Alphonse Picard père et fils, 1915, pp. 431-432.

③ 参阅 Henri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ékin*, Leyde, 1918.

(三) 围绕钱德明的跨文化研究

在已经出版的研究中,将钱德明放到中西文化交流大背景中去加以考察的相对较少。钱德明研究多是由教内人士完成,他们偏重于档案材料的整理爬梳,目的是凸显其在传教事业上的重大贡献。另外,相关研究者多为西人,缺少对中国文化加以观照的意识,研究工作也因此常常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最近一些年来,也出现了少量跨文化视阈的研究。法籍华人陈艳霞(Tchen Yen Hia)所著《华乐西传法兰西》(*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1975)是一篇比较研究的论文,该书用了相当篇幅介绍钱德明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播活动,即各种传统乐器和中国古代声律向西方的介绍工作。首先,该书介绍了钱德明翻译的《古乐经传》的基本内容,探讨了当时法国知识界对该译文的接受情况,诸如拉莫(Jean Philippe Rameau, 1683—1764)和鲁西埃等。该书展现了钱氏对中国音乐的接受和再接受过程,考察了他在音乐方面与欧洲学者进行的交流互动。随后,该书详细研究了《中国古今乐记》,涉及中国音乐史、各种乐器、中国音乐十二律以及音阶与和声等内容。该书还辟出专章整理钱德明关于中国音乐的著作和文献。另外,作者探讨了钱德明的媒介身份,考证了接受过程中的某些误读,并在中西音乐交流中对其进行定位。该书是第一部较系统深入研究钱德明对中国文化接受的著作,再现了整个接受过程,凸显了钱氏在中西音乐交流中的媒介作用。^①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出版了《钱德明之中国宗教舞:民族舞蹈学之源》(*Les danses rituelles d'après Joseph Marie Amiot : Aux sources de l'ethnochorégraphie*, 2005)。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对上述音乐研究的极好补充,因为陈艳霞对舞蹈虽有涉猎,但因舞蹈并非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故未能展开讨论。该书收录了钱德明 1788 年和 1789 年所撰手稿《大舞》(*Mémoire sur les danses religieuses des anciens Chinois. Grandes danses*)与《小舞》(*Mémoire sur les danses religieuses, politiques et civiles des anciens chinois. Petites danses*)。手稿内容主要出自明朝朱载堉(1536—1611)所编舞谱,作者对钱德明的工作加以点校批评。对手稿源头的考证将此研究导向了与音乐、诗歌和舞蹈相关的中国文学研究,这是

^① 参阅 Tchen Yen Hia, *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1975.

本书的一大特色。此研究还将译文和原文加以对比,让我们更好地洞悉了钱德明的文化心理,通过他对舞蹈学的理解接受进而展现出接受者的文化心态和对中国的想象作用。这是在钱德明研究中具有比较意识且重视从原典入手的有益工作。^①

另外,孟华在博士论文《伏尔泰与中国》(*Voltaire et la Chine*, 1988)中将钱德明纳入到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相关内容篇幅不多,着重分析了其译诗在帮助伏尔泰构建中国形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中国开明君主形象深化与加强的原因。^②

通过对上面三方面研究内容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二百多年来,对钱德明的研究取得了不同的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某些不足之处。钱德明在学界享有盛名,但其作品却往往被束之高阁,少人问津。考察个中缘由,大致有二:一是因为他的许多作品目前还是手稿形式,分别收藏于法兰西学士院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处,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二是他的主要作品均为法文写作,而18世纪的法语与现代法语有一些差距,对国内研究者来说,这算是一个不小的障碍。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中国学者的工作明显较少,而国外学者又大都从历史角度入手,忽视了钱德明跨语言、跨文化的这种独特身份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对钱德明研究的课题史似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有关钱德明生平史实的研究过于笼统,往往属于泛泛之谈,缺少系统深入的分析。

其次,虽然有些作品试图刻画和再现钱德明所处历史文化语境(教会内),但就此止步,未能对语境进行全面和综合的研究。

再次,即使有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比较方法,但均限于一个特别的领域(音乐和舞蹈),并非在于从总体上去把握时代语境,也未能对钱德明的诸多文化身份进行系统考察,忽略了他在介绍这些音乐、舞蹈作品中深层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心理动因。陈艳霞在研究中虽然也指出了钱德明的某些错误和误读,但仅仅限于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没有考虑翻译策

① 参阅 Nicolas Standaert, Yves Lenoir, *Les danses rituelles d'après Joseph-Marie Amiot : Aux sources de l'ethnochoregraphie*,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Namur, 2005.

② 参阅 Meng Hua, *Voltaire et la Chine*, thèse de doctorat soutenue à l'Université de Paris Sorbonne (Paris IV), 1988.